

“两弹元勋”于敏：学术如山，性情如水

作为“两弹一星”元勋之一，于敏是我国自主培养的杰出的核物理学家，也是我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物之一。荣获“两弹一星”功勋奖章、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、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、国防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等十几项重大奖项的于敏，曾经为了我国的核武器研究而“隐身”长达30年之久。

于敏在回忆自己的“转行”心路历程时说到，“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我留下惨痛的记忆，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，也不能受旁人欺负，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，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。”

于敏说，自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。正是因为怀着对和平的强烈渴望，才让本

有可能走上科学巅峰的于敏，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默默无闻的核武器研发。

“我当然不愿意打仗，我打心眼里赞成核武器最好都彻底销毁、完全禁止。可是，在50年代，核大国几次威胁要使用核武器来打我们，你要想不受人家欺负的话，就不能没有核武器。”

“学术如山，性情如水。”于敏不仅以其学术贡献令后辈们高山仰止，更以平和善良的性格赢得了身边人的爱戴。一位昔日的老同事透露，由于极为平易近人，于敏私下里被同事和晚辈们亲切地称为“老于”、“于老爷子”。

和于敏一起工作过多年的郑绍唐研究员说，单位的晚辈们都很喜欢他，特别喜欢向他请教，因为他从来没有“怎

么连这个都不懂”的苛责，有的只是悉心的指导，有时候，为了给后辈演示得更清楚，在病床上的他，一个推导过程就能写好几页。

曾经幽默地自嘲为“硬件老化了，软件也过期了”的于敏，在学生蓝可看来，“脑子永远只有20多岁。”

“老师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学方法。”学生蓝可对老师的治学风格几近崇拜，这从她描述老师时候的用词就可以看出：“锲而不舍”、“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”、“透过现象看本质”、“基础理论与实际应用相结合”、“学识广博”、“勇于创新”……

蓝可说，老师最大的特点就是爱国，“这一点从他的话里话外到处都能

感受到”。

于敏虽然是一位大物理学家，但他最大的爱好是中国历史、古典文学和京剧。他从小就会背不少古诗词。他喜欢读的书有《资治通鉴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红楼梦》等等。隔三岔五地，他还会去看上一次从小就爱看的京剧。

儿子于辛说，父亲最崇拜的历史人物就是诸葛亮和岳飞。诸葛亮的“淡泊明志，宁静致远”是他座右铭，也从小就教育子女“只有淡泊名利、潜心做事，才能有所成”。而父亲教会他心爱的孙子的第一首诗，就是岳飞的《满江红》。

人民网 文/赵竹青

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信：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，看过许多次数的云，喝过许多种类的酒，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。

这段写得很普通的文字，被渲染成了“民国最美的情书”。当年沈从文作为上海公学的老师，不断地给女学生张兆和写情书，张兆和跑到校长胡适那里去告状。胡适却说：他顽固地爱你！张兆和却说：我顽固地不爱他！

爱与不爱费思量

胡适随后给沈从文写了封信说：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，更不能了解你的爱，你错用情了。你千万要坚强，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。此人太年轻，生活经验太少……故能拒人自喜。

张兆和虽然最后还是嫁给了沈从文，但始终是不懂、也不大欣赏沈从文。沈从文到他湘西老乡熊希龄的香山别墅去，遇上了在熊家做家庭教师的高青子，她也是文艺青年，原是西南联大的图书馆职员，她对沈从文充满了崇拜。

一次，沈从文又去熊家，高青子特意穿上一件绿地小黄花绸子夹衫，还在衣角袖口染了一点紫，这样的打扮源自于沈从文一篇小说中的女主角；她的聪慧和用心深深触动了沈从文。在那段时间，沈从文常常出入林徽因的“太太的客厅”。

张兆和知道此事之后，非常恼怒、生气。为了挽回他们的婚姻，善良的亲友们活动起来了，甚至有人给高青子介绍对象。

半个世纪之后，沈从文提起这段往事时仍说：高青子长得很美。有几年的时间，沈从文和家人分居两室。每天晚上，他到张兆和那里去吃晚饭，然后带回第二天的早饭和午饭去住处吃。这个时期，沈从文和张兆和之间完全说不到一块，他们是鸡同鸭讲，一个抱怨家的钱不够用，一个指责她爱他不够多。

那段时间，沈从文被单位安排去打扫女厕所，他因此极度苦闷和痛苦，因为抑郁症一度住进了精神病院。多年之后，曾有一位女记者采访他，问及当年这事，沈从文竟拉住她的手，号啕地哭了起来，委屈、羞辱啊！

沈从文在给张兆和的一封信中写道：小妈妈，你不用来信，我可有可无，凡事都这样，因为明白生命不过如此，一切和我都已游离。

张兆和在《沈从文家书》的后记中写道：从文同我相处，这一生，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？得不到回答。我不理解他，不完全理解他。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，但是，真正懂得他的为人，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，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。过去不知道的，现在知道了；过去不明白的，现在明白了。

晚年的张兆和充满感慨地说：太晚了！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，不能发掘他，理解他，从各方面去帮助他，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！悔之晚矣。

《羊城晚报》



钢铁，号称新中国工业的脊梁。高性能特殊钢，又是托举一个国家钢铁工业水平的巨臂。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崔崑，一生矢志于祖国的钢铁材料事业，为我国特殊钢的发展，做出了突出贡献。

1960年，崔崑从苏联学成回国。当时，新型高性能模具钢是我国工业生产急需品，但无力自主生产，每年需动用大量外汇进口，且价格是普通钢的10倍以上。

要做出中国人自己的高性能模具钢！崔崑心急如焚，和同事们加紧建设

“一盯就是一个通宵”

崔崑在1200℃熔炉里炼就“钢铁人生”

实验室。可是，谈何容易。当时，我国研究模具钢的实验室基本上是空白，能够买到的设备，学校支持购买，买不到的盐浴炉等仪器设备，他就和同事根据图纸自行设计、自己动手做。

“用这个炉子我最担心的什么呢？一个是温度要准确。温度不准确，相差十度的话它的性能就不一样。第二个我的担心怕出事故，因为这个盐浴炉一碰到水就爆炸，所以我就担心这个事情，所以我必须亲自去。”盐浴炉做好后，如何控制温差是个大问题。那时候没有温控自动化技术，他们只能用最“土”的办法控温——眼睛紧盯温度显示器。

忆及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，崔崑的眼里饱含深情：“我们几个老师经常

守在1200多摄氏度的盐浴炉旁，手指按着控温开关，一盯就是一个通宵。”最终，崔崑和研究人员一同研发了低铬模具钢，含铬率降低到4%，使用寿命延长一倍，打破了国外垄断。

崔崑先后研制出10种新型自主知识产权新型模具钢，在数十家工厂得到应用，按当时的标准，累计创造直接经济效益2亿多元。

2013年，崔崑与夫人商量，决定将全部积蓄捐给华中科技大学基金会，成立“勤奋励志助学金”，用于资助品学优良经济困难的本科生，每人8000元。从那时起至今，他们共捐资420万元，每年资助45位本科生，至今已有100多名学子受到资助。

央视网 2017.6.7 A-A+

席泽宗的遗憾与幸运

席泽宗是我国科学史界的泰斗、天文学家和天文学史专家。他61年前发表的《古新星新表》至今为科学界瞩目；他做出这一科研成果时，仅是大学毕业没几年的本科生；在他80岁时，一颗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。

1948年元旦，席泽宗在广州《越华报》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《预告今年日月食》。此后他一边学习，一边在广州《建国日报》、《前锋日报》、《南方日报》、香港《大公报》等多家

报纸上发表了几十篇文章。

1950年冬的毕业前夕，席泽宗想到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工作。中山大学教授邹仪新给张钰哲写了一封介绍信，“大作《宇宙丛谈》的一位读者，经过种种辛苦，越过万水千山，将要求教于作者门下，您当有自傲之感。”但毕业时，人事部把他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编译局（科学出版社前身），担任《科学通报》的编辑工作。席泽宗很遗憾没有成为张钰哲的

门徒，但幸运的是，在这里他遇到了竺可桢，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，恰好主管编译局的工作。在席泽宗眼里，竺可桢是真正的科学家，“老好人，学问很大”。尽管时年席泽宗只有20来岁，但竺可桢在学术上对他提携有加。

作为中国第一代科学史家，席泽宗院士生前从事科学史研究长达半个多世纪，不仅参与起草了“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（1956—1967）”中的科学史部分，还筹备建设了科学史研究机构——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、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等。

科普中国

挽救民族手工艺 林徽因为景泰蓝奔走

上世纪40年代，由于多年战乱，民不聊生，景泰蓝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，使珐琅成本不断提高，加之海运汇价昂贵，致使珐琅艺人的生活难以为继，从业人员锐减，整个景泰蓝行业岌岌可危。

为挽救这一民族传统工艺，1950年北京市相关部门到清华大学聘请梁思成、林徽因做顾问，指导工艺美术创作设计。于是，梁、林二人在清华大学营建系成立了“工艺美术抢救小组”，从此与景泰蓝结缘。

林徽因极钟爱景泰蓝，她描绘景泰蓝有“古玉般温润、锦缎般富丽、宋瓷般自然活泼的特质”，她和她的学生们为了挽救这项民族手工艺开始了不懈的努力。

清华大学的景泰蓝抢救小组成员还有钱美华、常沙娜、孙君莲、高庄、莫宗江等人。当时，北京仅存的几家作坊和景泰蓝厂子大都处于

倒闭边缘，新老艺人青黄不接，图案单调，缺乏创新。而要拯救这一濒临灭绝的民族艺术，最关键的是调整生产结构，全面更新设计，才能起死回生。

当时用于景泰蓝的图案只有荷花、牡丹花和勾子莲等几种，几百年来一直没有太大的变化，而中国的装饰图案始终是在千变万化中发展着。林徽因找出了珍藏的历代装饰图案，让大家学习研究。后来她又带着学生多次到景泰蓝作坊调查研究，从掐丝、点蓝、烧蓝、磨光、镀金，一道工序跟着老艺人们干活，熟悉每一个工艺流程，细心观察各道工序的操作，了解景泰蓝的工艺特点，提出改进方案，设计了新的纹样和色彩图，并反复调整修改，然后拿给工人们去试制。

在林徽因的指导下，美术组为景泰蓝设计了一批具有民族风格的新颖

图案，突破了以往单调的荷花、牡丹图。在梁思成的积极倡导下，特艺公司还在崇文门外喜鹊胡同3号成立了研究、制作景泰蓝的国营特艺实验厂，将许多散落民间的景泰蓝艺人请进厂参加实验。当时有几位老师傅被迫改行拉黄包车了，被请回厂时激动得热泪盈眶。

他们的创新设计和抢救工作，引起了国家相关领导的关注和重视。当时，北京正在进行“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”和迎接苏联文化代表团访问中国的筹备工作，这两项国际性活动的礼品和大会美工都交给了美术小组。林徽因带着钱美华几人反复推敲礼品的品种与设计方案，最终他们设计的景泰蓝台灯、烟具、金漆套盒、花丝胸针、敦煌图案丝巾等确定为赠送贵宾的礼品。郭沫若称“这是新中国第一份国礼”。

《北京晚报》文/张鹏